



华夏文摘增刊
文革博物馆通讯（三五二）

CHINA NEWS DIGEST — CHINESE MAGAZINE (CND—CM)

• — • — • 中国新闻电脑网络（CND）主办 • — • — •

—— 增刊 第五一八期 ——
（二〇〇六年八月七日报出）

本期目录 （zk0608b）

【当事人说】“文革”中的“军宣队”——一位大学“军宣队长”的回忆 陈 昭
【往事回首】“文革”中的龚澎和乔冠华 张 颖
【史海钩沉】“揪军内一小撮”口号的实质和来龙去脉 阎长贵

小启：本期通讯所刊载的材料已经全部增补到网上《文革博物馆》“最新展出厅”及各有关“展厅”，欢迎前往参观。

文革博物馆》网址：<http://museums.cnd.org/CR>

欲订阅本刊《文革博物馆通讯》请致函 cnd-info@cnd.org 获取订阅资讯。

来稿请以纯文本形式投寄 tougao@cnd.org。请在 subject 中标明 CR 字样。

【当事人说】

“文革”中的“军宣队”
——一位大学“军宣队长”的回忆

• 陈 昭 •

军队是“文革”中唯一没被打乱的组织，由于它严格的纪律、严密的组织和高高在上的地位，毛泽东依靠军队才基本上控制住了“文革”初期近乎于失控的局面。而“文革”中军队介入、控制地方各单位的活动，主要是通过所谓的“三支两军”（即支持革命左派、工业、农业、对学校的军训、对各类单位的军管）。军队的“三支两军”贯穿“文革”的前7年（1966年到1972年）。1968年起军队人员往往以“解放军毛泽东思想宣传队”（以下简称“军宣队”）的身份执行“军训、军管”任务，笔者当年就主持过北京一所高等院校的“军宣队”。现在距“文革”的发动已有40年之久，但在诸多回忆和研究“文革”的文献中，关于“文革”中的重要角色“军宣队”的介绍却很少见到，而官方文献对“三支两军”的介绍也语焉不详。再过若干年，或许就没有多少人能讲得清“三支两军”的由来和真实功能了。事实上，不了解“军宣队”在“文革”中的作用，理解“文革”中“由乱到治”的演进过程就会有一定的困难；而不了解“文革”的“乱与治”，也就无从评价“文革”的历史地位。本文根据笔者掌握的资料和亲身的经历，大致介绍“军宣队”在“文革”中的作用，供研究者参考。

一、“三支两军”概述

1. 毛泽东要求军队“支持革命左派”夺权——谁是“革命左派”？

1966年“文革”发动伊始，毛泽东按照自己的设想，以为可以在很短的时间内就把刘少奇“司令部”摧毁，然后依靠“造反派”控制局面。1966年12月26日，毛泽东特意举办了生日宴会，只让“中央文革小组”的干将们参加，“吃饭时毛主席举杯祝酒，说：‘祝全国全面的阶级斗争’……这话是正确地概括他对当前形势和今后作法的想法。”〔1〕毛泽东当时打算把“夺权”作为“文革”的4个阶段中的最后决战阶段，按照他的“战略部署”，1967年1月全国刮起了“夺权风暴”。在“夺权风暴”的高潮期，毛泽东表示：“夺权问题……是决战的关键阶段，是主题，是正题。〔2〕”可现实的演变完全超越了毛的如意算盘，事实上当时全国上下的“夺权风暴”演变成各地“造反派”组织之间延绵不绝的“武斗”和“打砸抢”，原来的党政系统近乎于瘫痪，而全国各地“造反派”组织争夺当地最高权力的斗争又方兴未艾，彼此之间呈你死我活的状态，根本无法“联合”起来分享权力。这时连毛泽东自己也掌控不了局面了。当时毛也承认：“本来在一月风暴以后，中央就在着重重大联合的问题，但未得奏效。〔3〕”

正是在这种被动局面下，毛泽东不得不动用军队这张最后的“王牌”，以支持“革命左派”为名，尽快控制局面。1967年1月毛泽东对军队指示说：“地方文化大革命正在猛烈开展，夺权斗争还在激烈进行，我们军队要支持地方革命左派进行夺权斗争。〔4〕”他在另一场合又表示：“以后凡有真正革命派要求军队支持、援助，都应当这样做。所谓不介入，是假的，早已介入了。〔5〕”这是毛泽东对“支持左派”、支持“真正革命派”的最早表述，也就是“文革”中军队“支左”一词的来源。

然而，全国各地多如牛毛的“造反派”组织中，究竟谁是“革命左派”，哪个群众组织不是“革命左派”？毛和“中央文革小组”却提不出一个名单，而是对参与“支左”的军队人员“打哑谜”。在这种情况下，各地的军队面对严重对立的几派群众组织，摸不清究竟谁是“革命左派”，就只能按照自己的判断“支左”，结果与毛泽东和“中央文革”的要求大相径庭，甚至完全相反。于是毛认为军队“右倾”，他在1967年8月4日致江青的信中说：“现在有百分之七十五的军分区（即师级）以上的干部支持右派〔6〕”。实际上，在很多省市，军队“支左”的结果反而加剧了“造反派”组织之间的“武斗”，形势变得越发混乱，实与毛的初衷相违。经过“中央文革”的强行介入，直到1968年大多数省市的形势才初步稳定下来。

由于“文革”中大批工人农民参与“造反”组织，动摇了工农业生产，于是毛泽东又发布指示：“军队不但要协同地方管农业，对工业也要管。……军队不能坐视工业生产下降而置之不理。〔7〕”作为样板，毛泽东把中央警卫团8341部队的干部战士派到了北京的6个工厂（北京新华印刷厂、北京针织总厂、北京二七机车车辆厂等），介入“文革”时期工厂的领导和管理，后来又派8341部队到北京大学、清华大学，这就是“文革”时期著名的“六厂二校”的由来。军队既已介入各地的“支左”，后来再加上“支工”、“支农”，于是就产生了所谓解放军在“文革”时期的重要任务——“三支”。

2. “军训”——毛泽东试图用军队控制大中学校的混乱局面

最初的“军训”是1966年夏毛泽东大规模接见“红卫兵”时临时性整训赴京学生的方法，后来起用到全国各地中学以上的学校。

1966年8月到11月，全国的学生像潮水般涌向北京，全市的机关、学校、空闲的民宅里，到处是临时铺位，人满为患，且赴京的数百万学生终日闲逛，无人管束。1966年10月，毛泽东发出“组织外地来京革命师生进行政治军事训练的指示”。他说：“由军队负责将

外地来京革命师生，按解放军的编制，编组成排、连、营、团、师。编好的，进行训练，学习政治，学习解放军，学习林彪同志和周恩来总理的讲话，学习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学习解放军的三八作风，学习编队队形，学习队列基本动作，学习步伐。每个人都要学会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歌子，使外地的革命师生有秩序地接受检阅。〔8〕”笔者当时所在的空军部队就奉派进入北京市朝阳区的一所小学。小学的老师负责外地赴京学生的生活安排（住宿、吃饭等），我们则负责每天组织外地学生训练两三个小时，教他们一些最基本的站队、走路动作，主要是提高学生的组织纪律性。

这次“军训”本来是针对赴京学生的临时性措施，可能后来毛泽东觉得这个办法可用来控制学生，尤其是有助于恢复全国各中学以上学校的秩序。当时，全国的中学基本上处于混乱状态，校方已失去管理能力，学校停课，学生终日无所事事。1966年12月中央宣布停止“大串联”以后，上千万在校中学生不能再去外地“串联”游玩，留在校园内又无课可上。为了应付这一混乱局面，1966年12月毛泽东发表了“关于派军队干部训练学校师生”的谈话：“派军队干部训练革命师生的方法很好。训练一下和不训练大不一样。这样做，可以向解放军学政治，学军事，学四个第一，学三八作风，学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加强组织纪律性。驻京部队派干部训练革命师生的经验很好，很有成效，应当在全国推广。〔9〕”于是，从1967年起，军队就逐步派出干部战士进驻各地的中学，组织军训，把中学生管了起来。

毛泽东看到了“军训”的好处，1967年2月19日又把“军训”的范围进一步扩大到“党、政、军、民机关，除老年外，中年、青年都要实行军训，每年20天（10）”。一个月后的3月7日，毛又要求军训人员“参与关于开学、整顿组织、建立三结合领导机关和实行斗、批、改的工作。〔11〕”

据统计，“从1967年1月20日至2月10日20天时间内，仅驻京部队即派出4，000余名干部，对北大、清华等5所著名高等院校计2．26万余名师生，进行了短期培训。之后，全军派出执行‘军训’任务的人员逐步增多，参训院校及人数也大幅度增加。仅1967年4月，全军每天平均派出执行‘军训’任务的人员即达5．3万余人，接受军训的学校则达3，091所。至1968年第二季度，全国接受‘军训’的学校猛增至1．17万余所。〔12〕”

3．“军管”——“军管民”、“民管军”、“军管军”

“军管”是“文革”中最荒唐的事情之一。起初，中央只是下令对广播电台、粮食和物资仓库、监狱等“要害”部门实行军管，随即扩大至民航系统。随着局势一天天的混乱起来，需要“管”的单位越来越多。各单位的“当权派”都被“打倒”了，“造反派”又互斗不已，谁能负起管理之责？只剩下部队了。于是，1967年3月19日中央军委根据毛的指示作出了“关于集中力量执行支左、支农、支工、军管、军训任务的决定”〔13〕（这一文件首次将“三支两军”作为一个整体性任务向全国全军提出）。仅在1967年前5个月中，解放军各总部、各军兵种、各军区就对全国7，752个单位实行了“军管”，并对2，145个单位实行了警卫保护，其中包括中央各部委、1，219个银行（占全国银行的42%）、547个广播电台（占全国广播电台的24%）、111家报社（占全国报社的53%）、10个铁路局（全国共18个铁路局）。〔14〕由此可见，“军管”的强度之大。

当时，不但军队对地方单位实行军管，军队对某些军队单位也开始“军管”。例如，毛泽东派人“军管”了总政治部。后来有研究者指出：“命令军队下级单位的有关人员，对军队的三大总部之一、军队的最高政治首脑机关实行军事管制，这确实是一件不符合常理的很‘搞笑’的事情。而这样的命令，除了自命为这支军队‘缔造者’的毛泽东本人，还有谁敢下达？”〔15〕

李德生也承认，这是“一场荒诞的闹剧”〔16〕。

更滑稽的是，1968年9月2日，按照毛泽东的指示，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发出了“关于工人进军事院校及尚未联合起来的军事院校实行军管的通知”。让工人“军管”军事院校，这样的荒唐命令可能在全世界都闻所未闻。这个文件的第五条规定：“北京地区的高等军事院校，政治学院，空军学院，后勤学院，第三工程兵学校，空军第二高等专科学校等六座院校，担负着中央办的毛泽东思想学习班的训练任务。对这六所院校待训练任务告一段时，再进驻工人、解放军组成的毛泽东思想宣传队。〔17〕”据我所知，此时，空军学院已经担负着“军管”北京地质学院的任务，可它自己竟然也即将被工人“军管”。

显然，当时毛泽东全面动用军队，把军队当作控制“文革”混乱局面的最后手段，实乃应付燃眉的仓促之举。军队全面介入地方事务之后，有些地方的局势是平稳了，但有的地方由于军队的介入反而更加乱了。更令毛戒惧的是，军队的“支左”和“军管”造成各级地方政府“革命委员会”的负责人当中军人占了多数，形成了军队全面掌权、全面膨胀的局面，但此时毛已经别无选择了。1972年8月，“支左”人员开始陆续撤回，“三支两军”遂告结束。

二、从“三支两军”到“工人解放军毛泽东思想宣传队”

1. 北京高校武斗高潮中出动“工人解放军毛泽东思想宣传队”

到了1968年夏天，“文革”又面临更严重的局面，各地“造反派”的武斗逐步升级，以致于发展到抢银行、抢仓库、抢车船、炸铁路、冲击军事机关、抢军队的武器。面对失控的形势，7月3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发布了关于制止广西大规模武斗的“布告”（简称“七三布告”）；21天后，中央又针对陕西局势发出“七二四布告”。这两个“布告”内容相似，大意是：最近出现一系列极其严重的反革命事件，破坏铁路运输，抢劫援越物资、银行、仓库，冲击部队，中断邮电，私设电台，抢夺解放军的武器，杀伤解放军指战员。出现上述情况的绝不仅仅是这两个省区。“布告”要求立即停止武斗，拆除工事，撤离据点；首先撤离铁路交通线上的各据点，无条件地迅速恢复铁路运输；无条件地交回援越物资；无条件地交回解放军的武器装备；一切外地人员和倒流城市的上山下乡青年应立即返回；对确有证据的杀人、放火、破坏交通运输、冲击监狱、盗窃国家机密、私设电台等现行反革命分子必须惩办。

这两个“布告”发出后，在北京的部队奉命行动。笔者所在的部队即到朝阳区王四营公社宣传“布告”的精神。然而，就在“布告”发布前后，武斗之风在北京也刮起来了，北京大学、清华大学校园内的武斗逐步升级。7月28日，毛泽东在凌晨3时半到8时半紧急接见了首都红卫兵“五大领袖”聂元梓、蒯大富、谭厚兰、韩爱晶和王大宾，就制止大学武斗、派出“工宣队”问题发表了强硬讲话。毛泽东说，现在轮到你们犯错误了。同时毛命令8341部队带领他们正在“支左”的北京6个工厂的工人组成“工人解放军毛泽东思想宣传队”，突然开进北大、清华两所大学。从此“三支两军”进入了一个新阶段，出现了新的组织形式——“工人解放军毛泽东思想宣传队”（以下简称“宣传队”）。这其实是“文革”初期被毛泽东痛批的“工作组”的变种，可称为“毛氏工作组”。

“宣传队”进驻北大、清华后，中央要求军队立即进驻北京其他所有大学。当时北京共有高校59所，驻北京的各军兵种分片包干。据我所知，空军、海军各负责10所院校，空军负责北京市东面的9个院校（即机械学院、广播学院、建筑工业学院、化纤学院、化工学院、第二外语学院、经济学院、北京工业大学等）和地质学院。我所在的空军第一高级专科学校（简称“一高专”）被指派负责北京建筑工业学院。

当时中央规定，在“工人解放军毛泽东思想宣传队”里“工宣队”的任务是“配合”解放军工作。北京市革委会规定，“宣传队”的最高领导为“指挥”和“政委”，“指挥”由“工宣队”出，“政委”由“军宣队”出，“宣传队”由政委负总责。北京市革委会主任谢富治曾对所有大学的“军宣队”负责人讲话说：学校出了问题我们不找“工宣队”，而要拿你们是问。“宣传队”直接受北京市革委会领导，市革委会有个大学组，但北京市革委会负责人经常直接召集“宣传队”负责人开会，就运动的进度、作法下达指示，谢富治讲得最多。空军系统也设有专门机构管理空军的这10支军宣队，但不指导各学校的“文革”运动；派出“军宣队”的部队也不过问“军宣队”的工作。

2. 从北京建筑工业学院“军宣队”的简况看“军宣队”的一般特点

北京建筑工业学院直属国务院建材部，是当时全国唯一专门培养建筑工业材料方面高级人才的学校。学校规模不大，有1千多学生。学院里老干部比较多，院长是位7级干部，在大学里非常少见。

我当时担任“一高专”革委会副主任。“一高专”是军级单位，我这个革委会副主任原来是个普通教员，从未担负过领导工作。空军领导让我参加“支左”时说：空军负责10所大学，我们派往9所大学的“一把手”用老同志（多是师、团级干部），另外用1个“小将”（“文革”中对群众组织的头头一般称为“小将”，所以称我为“小将”，其实当时我已29岁）。我曾坚辞不受，但还是没能推掉，只好硬着头皮上。

受领任务后，“一高专”派出1百多人执行这个任务（全是部队的机关干部），于8月中旬开进建工学院。其时，“一高专”的群众组织刚刚取消，大家集合到“革委会”这面大旗下，但过去不同派别的隔阂依然存在。我们这支“军宣队”中的大多数人原来属于我的对立派，对我来说，团结和带领好这支“军宣队”，本身就是个严峻的考验。

“宣传队”的另一半是北京铁路局根据北京市革委会的决定派出，由铁路局机关干部组成，号称“工宣队”，他们紧随“军宣队”之后进驻该学院。可是当时中央规定，“工宣队”必须“以优秀的产业工人为主体的，配合人民解放军战士，组成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分批分期，进入各学校”。〔18〕北京市革委会发现北京铁路局派出的“工宣队”不是产业工人，于是北京铁路局又重新派出1百多名真正的铁路产业工人替换了原来派去的机关干部。建工学院的“工宣队”在半年后由于铁路施工任务撤出了该学院。

我作为“军宣队”队长，自然而然地就以“工人解放军毛泽东思想宣传队”政委的身份成为“宣传队”的“一把手”，顺理成章地也就成了建工学院的“一把手”。担任“宣传队”“指挥”的是一个工人班长，只有小学文化程度，所以我必须承担主要的工作。当时北京对“三支两军”干部有这样一个顺口溜：“在家坐沙发，出门坐‘华沙’〔19〕。一串钥匙哗啦啦，里里外外我当家。”我就这样当了建工学院的家。那时我唯一的优势是属于群众组织头头出身，年龄与学生相差不大，能和学生打成一片，比较容易与学生领袖沟通。当时对“宣传队”也有一条特别的纪律，就是不许与学校师生谈恋爱。

三、从“大联合”到清查“五一六”——我在建工学院的经历

我在建工学院期间经历了两派“大联合”、成立学院革委会、“清理阶级队伍”、“战备搬迁”、清查“五一六”等阶段。从一所院校里这些事情的处理可以观察当时“军宣队”的作用。

1. 大学里的“文革”高潮是如何收场的？

我们进入学院时，学院里空空荡荡，很多人都不在学校，我们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发动每一个人，利用各种途径尽快把散在全国各地的学生和教职员召回学校。师生员工回校后，先把各种派别的群众组织“联合”起来，“解放”了一批“被打倒”了的干部，成立了“革委会”。“革委会”由“革命干部”和“学生领袖”组成，按规定“宣传队”不参加革委会，但学院“革委会”受“宣传队”领导，学校的实权还是掌握在“宣传队”手中。当时还有一项政治任务，即“清理阶级队伍”，我们没有打击“新”的“敌人”，只是清理了群众组织办理的各种专案，使那些“专政对象”得以解脱。

这些“文革”中奉命办理的任务完成后，我们又面临一个大难题：学生们不上课，教职员们不教课、不研究，每天让他们干什么？总不能天天学文件、“搞运动”，如果这样必然会越来越散。最后我们想出一招，派人四出联系，看有什么大型工程、大型企业需要劳动力，这样可以让师生们通过劳动开开眼界。这实在是没有办法的办法。当时，北京地铁正在兴建，房山的东方红炼油厂建设工程也正在施工，于是我们把师生们拉到这两个地方以及首钢参加劳动。

2. 大学的“战备搬迁”——“盲人骑瞎马”

1969年秋天，中央突然大造“要准备打仗”的舆论，一时间紧张得不得了，人们的感受是似乎战争明天就要爆发。北京市革委会召开了紧急会议，命令北京的大专院校除几个最著名的学校外，其他学校在半个月到20天内必须搬出北京。然而，连去哪儿都不知道，怎么个搬法？

一所大学不光有学生和教职员，还有教工家属，所有家庭举家搬迁，谈何容易？老人孩子怎么办？还回来不回来？什么时候回来？更何况，搬迁地还要准备住房、教室、实验室、工厂、图书馆，设备图书的安放、教学活动的组织，以及交通、生活设施等等，每所大学都面临一系列难题。而学院的教工们认为，你们“宣传队”将来可以回部队，学生们早晚一天要毕业，所以搬到偏远地区后你们都要离开，只有他们将不得不在那里长久呆下去，自然他们会顾虑重重。因此，教工们提出了许多非常实际而我们又无法解答的问题，比如往哪里搬，怎么搬，搬去怎么生活，孩子上学如何解决，不在这个学校的教工配偶的工作怎么办？为什么只有学校搬迁，而北京市其他单位却不搬？这些问题我根本无法回答，也没有人给我解释。上级只是给了我们一道死命令：搬！快搬！

建工学院的主管部门是建材部，根据部长赖际发、政治部主任钟炳昌、军管会主任李大同的指示，学院“宣传队”和“革委会”的负责人立即到河南、湖北、湖南选址。赖际发部长曾提示，湖南常德附近有一个即将报废的金刚石矿（601矿），那里有一些空房子。这个矿离常德约30到40公里，附近没有大的居民点。我们到现场实地考察后发现，如果把该矿的房子全部利用起来，勉强可住下学校的师生员工，但根本无法考虑教学活动。经请示建材部，最后就确定搬迁到这里，因为时间紧迫，再无选择的余地。当时，建工学院的搬迁全然不考虑将来的办学条件和教工的生活环境，只关心一件事，那就是找一处地方让全校人员勉强住下。

搬迁地一经选定，学院里就立即召开各种会议“动员”，那时师生员工们早就是驯服工具了，对“宣传队”的要求只能服从。于是，全院师生连同家属很快就启程了，把教学工厂、图书馆交给了留守人员。当时我是非常“革命”的。我安排全校迁移人员分成两路，教工和家属乘火车到岳阳，然后转到常德；另一路由我带领，先到韶山“朝圣”，然后徒步行军走到目的地，风风雨雨，一共走了3天半。到了金刚石矿，人是住下了，但是没有床，也没有桌椅板凳，一律打地铺。因为房子非常少，老师们根本不可能一家一间，许多教工只好两家挤一间房，中间拉

一个布帘。即使在如此艰苦的环境里，上级还下达了挖防空洞的任务。我们虽然已身处偏僻山沟，也照样得象城市里那样挖防空洞。

据我所知，当时北京许多院校都与我们有类似的处境。象北京机械学院迁往陕西，北京矿业学院迁到四川合川县三汇坝，北京电力学院搬迁河北省邯郸地区岳城水库工地及邯郸、马头、峰峰三个发电厂，情况都与我们学院相似。中国科技大学接到迁出北京的命令后，曾派人分头去四川、河南、山东等省联系外迁，却没有一个地方欢迎科大，最后是安徽省合肥市同意接收，安置在原安徽师范学院内。这样的环境和条件算是好的了，既进了大城市，又有现成的校舍可用。

当时，不仅北京的大学奉命搬迁外地，其他省市的大学也接到搬迁通知。例如，哈尔滨工业大学南迁重庆；广东省原有20所高等院校，“文革”时期只准留10所，于是暨南大学被撤销，广东工学院迁到粤北改名为广东矿冶学院，华南工学院一度分为广东工学院和广东化工学院。（20）

有人说，学校搬迁是由于林彪关于战备的“一号号令”造成的。其实，1969年林彪关于战备的指示只是要求军队准备应付可能发生的突然袭击，丝毫不涉及地方事务。大专院校仓促迁离大城市，涉及面很大，影响深远，应当是中国教育史上“文革”时期一个非常值得研究的课题。我认为，这个决定是完全错误的，当时慌乱地搬家，盲目地找地方，怎么会有好结果？这种搬迁决策把国家教育事业的前途等扔到九霄云外，毫无疑问，穷乡僻壤绝不是办大学的适当地方。果然，不久之后，搬出北京的大学又都一所一所地重新搬回大城市，有的回到北京，有的换到别的城市。我工作过的建工学院在常德滞留两年后，也于1971年10月搬到武昌，1985年更名为武汉工业大学。

3. 清查“五·一六”——清算“造反派”

1970年3月27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清查‘五·一六’反革命阴谋集团的通知”。该通知声称：“五·一六反革命阴谋集团，在反革命两面派肖华、杨成武、余立金、傅崇碧、王力、关锋、戚本禹操纵下，向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猖狂进攻，罪大恶极。”现在已经看得很清楚，这个文件的指责纯属荒唐，是无中生有。肖华、杨成武、余立金、傅崇碧根本不是“反革命两面派”，而是“文革”中遭受迫害的将领；王力、关锋、戚本禹也与所谓的“五·一六反革命集团”无关。一个“反革命阴谋集团”的头子竟然全是子虚乌有，显然这次清查“五·一六”的真正目的意在它处，毛及“中央文革”不肯明言。

该文件并未明确规定“五·一六”分子的标准和界限。当时，上级指示，凡是有“三指向”（将矛头指向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指向“三支两军”，指向新生事物“革命委员会”）行为的人，就要在这个运动中清查。所谓的“三指向”其实是可以做出无数种解释的，这使清查有了很大的随意性；而“三指向”与以往的“反革命”罪不同的是，它很容易被延伸到“文革”中最活跃的“造反派”身上。因此，很自然地“清查”运动的矛头就指向了在校大学生里“文革”初期的积极分子。这个运动是对“文革”初期积极分子的一次严重打击。领导这个运动，是我觉得最对不起建工学院学生的地方，也是我抱恨终生的遗憾。（21）

那时上级明确指出，建工学院1967年发起的中南海“揪刘火线”是“反革命事件”，是以“揪刘”为幌子，阴谋搞暴乱，对这件事一定要查清楚。“清查”开始时是开大会揭发、造声势，主要是揭发“文革”初期谁“打砸抢”了，谁冲击建材部了，于是“文革”初期响应毛泽东和“中央文革”号召的许多活动到了1970年又都成了“罪行”。当时“军宣队”和“革委会”把当年“造反派”的几个重要人物挑出来，成立专案组，隔离审查。这些青年学生的痛苦

是可想而知的，建工学院有一个学生董临平就是在此次运动中自杀的。

“文革”开始时，毛泽东为了打开局面，拼命鼓动学生们“造反”；一旦毛达到了目的，就把他们一脚踢开；不仅如此，还要借清查“五·一六集团”之名清算“造反派”。有人指出，“文革”中有3次因冤案而死人的高峰，其中的第三个是1968年到1970年的“清理阶级队伍”、“一打三反”和清查“五·一六”。这3个运动都是由“革委会”、“军宣队”、“工宣队”领导的，“文革”时期因冤案而死的人中，绝大部分死于这一时期，大部分是受不了折磨自杀的，一部分死于酷刑，还有少数人被枪毙了。这个时期整死人的事件，几乎各单位都有，超过其他时期的总和。联系到全国的情况，就更能看出它的严重性。当然，各单位“革委会”、“军宣队”、“工宣队”的具体作为也有很大差别。如清华大学只抓出一个所谓“五·一六分子”，北京地质学院一个也没有抓出来，而有的地方却抓出了成千上百“五·一六分子”，其中冤案之多可想而知。

四、从“三支两军”引发的思考

1981年官方在《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对“三支两军”的评价是：“派人民解放军实行三支两军（支左、支工、支农、军管、军训），在当时混乱情况下是必要的，对稳定局势起了积极的作用，但也带来了消极后果。”这个说法十分含混模糊。“三支两军”到底起了什么积极作用，它又带来了那些消极后果等等，在“文革”研究中需要有具体的分析。

毛泽东支持“造反派”在“文革”初期“造反”、“夺权”，造成了社会的巨大动乱，“武斗”、“派仗”比比皆是。在这种极度混乱的情势下，由军队介入地方工作，对稳定全国局势无疑具有正面和积极的作用。军队在如此复杂的环境下做了大量的工作，使社会秩序趋于稳定，减少了人民生命和财产的损失。稳定的局面使原本中断的工农业生产得以逐步恢复，使全国的交通、金融、建设等各项工作得以运行。这些都是“三支两军”的功劳所在。“三支两军”过程中当然存在着许多问题，因为这本来就不是一个“治本良方”。

需要指出的是，“三支两军”完全不是毛泽东的“高瞻远瞩”，而是出现混乱被动局面后的应付性措施。毛在安排“三支两军”的过程中，其实一直是走一步看一步，属于“摸着石头过河”，这充分显示了“三支两军”的被动性。

从“三支两军”的全过程可以清楚地看出，它的决策权完全掌握在毛泽东一人手中，重要决定全部出自毛泽东。“文革”中有一个官定口号写入各种文件：“中国人民解放军是毛主席亲手缔造、林副主席直接指挥的”。毛泽东本人还曾为这个口号的后半句表示过不满：“缔造人民解放军、领导我们军队的人，能缔造、能领导，就不能指挥吗？他们把缔造和指挥分开，难道缔造者就不能指挥呀？”（22）其实，这个口号是一个伪命题。因为解放军的直接指挥者从来就只有一个人，但此人不是林彪，而是毛泽东。林彪只是个军委副主席，而且是个不管事的副主席，没有实权的副主席。在林彪之上还有大权独揽的军委主席毛泽东。嗜权如命的毛泽东尤其看重军权。在他“退居二线”时，他可以把党权、经济权力交出一部分，但他的军委主席从未“退居二线”，他对军权一天也没有放松过，从不许任何人染指。军队在什么时候使用，对什么方向使用，如何使用，都只能由毛泽东一个人决定。“三支两军”的过程表明，所谓的“党指挥枪”、“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其实是“毛指挥枪”和“毛对军队的绝对领导”。

由此推及有关军队的所有重大问题，例如至今仍被许多人搅成浑水的1969年10月18日全军进入紧急战备（即所谓林彪“擅自”发布“一号令”问题），军队高级领导人的重用（如李德生、纪登奎）或打倒（如贺龙、罗瑞卿、肖华、杨成武、余立金、傅崇碧等），“揪军内一小撮”的提出和戛然而止，等等，都是毛泽东一个人说了算。因此，研究“文革”必须弄清军

队在“文革”全过程的表现、作用以及军队活动的来龙去脉。如果一看到穿军装的人就说是“林彪的势力”，或者一看到穿军装的人被“打倒”就说是林彪干的，这就把严肃的历史变成了儿戏，势必得出南辕北辙的结论。

“三支两军”实行之后，军队干部全面进入了党、政、教育等各个领域、各个系统，掌握了相当大的实权。中共“九大”开会时，会场内满眼都是军人。鉴于此，有人说“林彪的势力膨胀了”，此言大谬。军人数量过多，而且参与到党政核心部门，在现代政治中当然是非常忌讳的事。但这是谁造成的？是毛泽东。绝不能看到这些人与林彪穿着同样的服装，就说他们是“林彪的势力”，其实绝大多数军队干部与林彪并没有直接关系。有些人故意这样说，不过是为打倒林彪制造罪名而已。

毛泽东让一群工人、军人开进国务院各大部委，开进各省市，开进堂堂的高等学府，开进工厂企业和农村，发号施令，当家作主，这哪里有一点法制的影子？“军宣队”、“工宣队”进驻大学，工人、解放军“上大学、管大学、用毛泽东思想改造大学”，“工人阶级登上上层建筑的斗、批、改舞台”，让一个科长（迟群）、一个机要员（谢静宜）掌管中国的两个最高学府，把大学大批搬迁到偏僻的山沟农村，这一切，都明显地标示着毛泽东不重视教育、敌视知识分子的印记。批判这些政策是彻底否定“文革”不可缺少的重要方面。

军队被迫而生硬地介入地方政权工作，其消极后果也相当严重。毛泽东的政策本身就是错误的，而各级地方官员执行这些政策时又变本加厉，结果让一大批地方上的干部和群众遭了殃。再加上军队干部缺乏地方工作经验，外行领导内行、瞎指挥，造成了很多不必要的和人为的困难和损失。参加“三支两军”的军队成员良莠不齐，若派到一个单位的军队负责人的个人品质好一些，政策水平高一些，这个单位就会少一些折腾，群众就会少遭一些罪；反之，如果军队负责人的个人品质恶劣，拉一派打一派，那这个单位的群众就遭殃了。

大批军队干部转到地方工作，尤其是进入党和国家的高级机关，甚至接近了“中枢”（所有进入中央部委的人）或进入了“皇宫”（像王良恩到了中央办公厅），他们所面临的形势其实相当复杂危险。“伴君如伴虎”，可是这些一辈子呆在兵营里的武将根本不懂其中的厉害，结果酿成了许多悲剧。他们虽然勤勤恳恳地工作，可是后来很多人被诬为林彪、“四人帮”的死党或余党，或被当成“三种人”，受了不白之冤（如21军政委施义之），甚至死得不明不白（如沈阳军区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李震、南京军区政治部副主任王良恩）。而当年安安稳稳在军队工作的人或那些及早从“三支两军”岗位抽身返回部队的人，却大都能“安全降落”，得以安享晚年。此一时彼一时，让人唏嘘不已！

总结这段历史的经验和教训，使我们更清楚地认识到，军队本应是保家卫国的力量，绝不能是一党一人的私家武装，更不能成为打倒政敌的武器。军队介入政治虽然在“文革”这样特定的历史时期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但却后患无穷。无论是“文革”之中的“三支两军”，还是后来邓小平主导的“六四事件”，都能看到其消极甚至恶劣的后果。这些教训都告诉我们一条普世真理——不走“军队国家化”的路是绝对不行的。

注 释

（1）《王力反思录》上册，香港北星出版社，第323页。

（2）“毛泽东接见阿尔巴尼亚军事代表团时的谈话”（1967年5月1日），见宋永毅主编的《中国文化大革命文库》光盘。

（3）出处同注（2）。

（4）“对军队文化大革命的指示”，见宋永毅主编的《中国文化大革命文库》光盘。

（5）“毛泽东对南京军区党委关于是否派军队支持造反派的请示报告的批语”（1967.1.2

1), 见宋永毅主编的《中国文化大革命文库》光盘。

(6) 转引自《王力反思录》下册, 第853页, 香港北星出版社。

(7) “毛泽东在沈阳军区组织机关干部到工厂宣传毛泽东思想情况简报上的批语”(1967年3月3日), 见宋永毅主编的《中国文化大革命文库》光盘。

(8) 见宋永毅主编的《中国文化大革命文库》光盘。

(9) 出处同上。

(10) 出处同注(8)。

(11) 出处同注(8)。

(12) 刘炳峰, “中国人民解放军‘三支两军’的前前后后”, 《党史纵览》, 2006年第1期; 《华夏文摘增刊》335期。

(13) 该决定全文如下:

各总部、各军区并转各省军区、各军、各军兵种、各院校:

为了适应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新阶段形势的需要, 集中力量完成毛主席赋予军队的支左、支农、支工、军管、军训等项重大任务, 军委决定:

一、军委各总部、各军兵种机关的“四大”, 一般在三月底左右暂告一段落。除了照顾战备、援外和必需的工作外, 视情况抽调三分之一, 二分之一, 甚至三分之二的人员, 立即投入支左、支农、支工、军管、军训的工作。这些单位究竟能抽调多少人员, 何时开始, 由各总部、军兵种党委讨论决定。

二、各院校、文艺团体、体工队(包括各军区所属的这些单位), 可在整风告一段落后, 立即全部投入上述工作, 作为这些单位文化大革命的一个重要步骤。这样做, 既可以增加支左、支农、支工、军管、军训的力量, 又可以使这些单位的人员, 更好地同工农群众相结合, 向工农群众学习, 促进思想革命化。这些单位的整风何时结束, 能抽调多少人员, 何时开始, 由各总部、军兵种、大军区党委讨论决定。

三、各总部、军兵种(包括在北京的所属院校)抽调的人员, 由总政治部统一分配、使用。驻各军区所在地区的院校抽调的人员, 统一由各大军区、省军区领导、调配和使用。

(引自宋永毅主编的《中国文化大革命文库》光盘。)

(14) 出处同注(8)。

(15) 余汝信《是谁下令军管总政?》, 见“林彪·军队·文革”网。

(16) 李德生, 《李德生回忆录》, 解放军出版社, 1997年, 第389页。

(17) 出处同注(8)。

(18) “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关于派工人宣传队进学校的通知”(1968年8月25日), 见宋永毅主编的《中国文化大革命文库》光盘。

(19) “华沙”是一种轿车牌子, 当时中国中级干部乘坐这种汽车。

(20) 参见《广东省志: 教育志》, 广东省地方史志编纂委员会编, 广东人民出版社, 1995年版, 第221至222页。

(21) 我的“军宣队”经历在这次运动开始后不久就结束了。当时, 中央要求, 北京的院校搬迁所在地的军区要尽快派员接管原来由北京军事单位派出的军宣队, 我们的搬迁地湖南属广州军区管辖, 所以广州军区从军区通信兵部队派出了军宣队于1970年3月底进驻建工学院, 我们则于4月中旬撤离建工学院返回北京。

(22) 汪东兴, 《毛泽东与林彪反革命集团的斗争》中之“1971年8月31日毛主席在南昌与许世友、韩先楚、程世清和汪东兴的谈话”。

~~~~~

## 【往事回首】

### “文革”中的龚澎和乔冠华

• 张 颖 •

—

龚澎和乔冠华都是我数十年的战友、至交，他们离开人世分别有三十多年或十多年，仍令我时常想念。他们曾共同为新中国的外交事业做出过许多贡献。尤其是龚澎，她是新中国第一代杰出的女外交家，外交部首任新闻司司长（当年称情报司），业绩斐然。为人一身正气、光明磊落。凡是曾经和龚澎一起共事的人，无不对她出色的工作和高尚品德倍加称赞，留下深深怀念之情，大家都为她的英年早逝感到十分惋惜。乔冠华在他人生的最后年月，也曾有过短暂的辉煌，还有一些人在他的头上戴过无数耀眼的光环，但历史难以改写，人亦无完人，我也为他晚年一些作为感到悲哀和痛惜。

1949年后，因工作各异，我与龚澎夫妇接触少些，但我们还很有缘分。1954年章文晋调来北京工作，我们一家和龚澎一家始终住在同一宿舍大院。从无量大人胡同（现为红星胡同）到以后，我们都是近邻。平常往来虽不太多，但当心里装着无处诉说的话时，很自然就会去找对方倾诉。

1965年我调到外交部不久，即随外交部四清工作队到江苏南通搞四清。1966年初，“文化大革命”的风已吹了起来，6月我们回到北京时已是狂风骤至。首先是在文化部门，那时章文晋早已被任命为驻巴基斯坦大使，我也被任命为驻巴基斯坦政务参赞，立即要去赴任。当时我思想上很矛盾：“文化大革命”是毛主席发动的，又是先从文化部门开始，而我在文化艺术部门工作了十年，一定会有这样那样的错误。虽说我已经调到外交部，但应回到原单位作个检查，有个交代，不应该就这样走了。我已经向外交部领导提出要留下来，领导却劝我还是应该走。一天晚上我正与文晋商量这事，文晋让我和他一起去巴赴任，飞机票都已经拿到了。这时龚澎来了，也劝我走，而我还是那股倔劲。他们都没办法，龚澎只好劝文晋一个人先去赴任，并提醒他要密切注意国内形势的发展。同时安慰他，因为我那时身体不好，她说她会照顾我，要他放心。岂料文晋走后不到10天，北京就乱了起来，一夜之间我就成了“三反分子、牛鬼蛇神”，被揪出来。学生很快冲进各文化机关，砸四旧，斗牛鬼蛇神，并且把我们都关进地下室。因为文晋不在，我还有一个小儿子无人照管，造反派允许我晚上10点以后回家给孩子做饭。外交部那时还比较平稳，在那幢宿舍楼中，我是第一个被揪出的“反革命分子”，哪还有人敢进我的家门？只有龚澎知道我的情况，晚上上我家来。我们两人都带着迷惑的眼光互相看看，好像根本就不明白到底发生了什么事。都想。毛主席发动的“文化大革命”还能有错么？她劝慰我说：你从小参加革命，对党忠心耿耿，但谁都有犯错误的时候，认识了就好，对党对自己都要有信心。在那样狂风恶浪的时候，能听到这样的话，多么暖人肺腑啊！

时间没过去多久，“文化大革命”那股火烧到了外交部，开始是反资反路线，接着打倒陈、姬、乔的大字报也上了街‘外交部各级领导都被揪斗了，姬、乔被揪到王府井大街卖小报，龚澎也被揪，行动不那么自由了。相反，先乱起来的单位，造反派内部打起派仗；把那些重要人物关押起来，对我这样的人倒放松了。只要每日向造反派交一份坦白材料或认罪书，就相对自由了，还可以出外看大字报”“受教育”。我一有机会就跑到外交部老部转转，又到王府井看看：姬、乔真的被押到大街上卖小报，我看到了老乔一副沮丧狼狈的样子，但还没有挨打。隔两天等到天黑半夜，我悄悄溜进龚澎的家，告诉她我看到的情况，让她放心。有一天回到院子里就

听人说：龚澎的家被抄了，她还挨了打。我非常焦心地等到半夜，又悄悄溜进她家，看到她双目失神，呆呆地独自坐在沙发上。我握着她冰凉的手，问她是否挨打了，什么被抄走了？她告诉我，造反派要她交出工作上所有的笔记本，她拒绝交出，有人发火抓她的头发想往墙上撞。他们最终还是到家里来把所有的笔记本抄走了。她最愤怒的是那些笔记本内有属于机密的内容。

1967年初，刮起全面夺权打倒一切之风，外交部也越来越乱了。那时我常到龚澎家给他们夫妇二人传递部内外的消息，我们常常关着门议论“文革”蹿上来的“红人”，对江青的言行我们都不以为然，乔冠华最恨姚文元，因为乔与吴晗的交情不错。龚澎在政治上很敏锐，她想得更深更细，她常常和我谈起，外交部受到那么大冲击，矛头是对着周总理和陈老总的。她认为首恶之人就是江青，摇扇子的是张春桥。我们之间共同语言很多，互相又都信得过，可以说无话不谈。说实话，在政治上乔冠华远远不及龚澎。在那样的大风大浪中，龚澎在掌着舵。1968年春，外交部许多大使、司长们贴出大字报：要求恢复陈毅外长的工作，即外交部出名的“九十一人大学报”事件。龚澎、乔冠华夫妇都在幕后支持，但不久又被批为右倾翻案的典型，他们夫妇又一次受到冲击。许多同志竭力保护他们，但龚澎从来都表现得光明磊落，坚定不移。她也在保护大家。

1969年我下放到湖南“五七”干校劳动去了，龚澎因为过度劳累，加上精神上不断受到刺激，不幸患上脑溢血病倒了，而且病情日渐严重。

恩来同志对她极为关怀。龚澎住医院期间第二次发病后，一直没能醒过来，医院曾建设开颅把血块取掉，有可能好转。当时老乔十分犹豫，怕有风险。恩来同志召集多方面的专家研究，认为既有一线希望还是应该争取。于是和老乔商量，决定开刀，争取能有好转。但最终因拖延时间较长，没能扭转病情。

1970年我从湖南干校回到北京，即去医院探望。那时的龚澎已完全靠各种器械维持着生命。我隔天都到医院探望，老乔常常坐在床旁，有时泪流满面，有时默默哀伤。有一次我又到病房，看见恩来同志正站在病床旁边，默默看着龚澎，在他脸上显出伤感和无奈。出门时看见了我，轻轻摇摇头走了。熟悉的人都知道，恩来同志对龚澎的才干和品德修养都很赞赏。对他们一家也十分关切，看到龚澎一病不起是十分难过的。

1971年龚澎离开人世。乔冠华和她共同生活、共同战斗近30年，感情十分深厚。她走了，老乔悲痛欲绝，人都垮了，终日借酒浇愁。他家的向南阳台，以往堆放一些杂物，这时却堆茅台酒的瓶子。他两三天就一瓶，很快茅台酒瓶子堆满了阳台。那时住在报房胡同的几位和老乔过从较密的朋友，如符浩、陈楚、普生和我，几乎每晚都到他家陪伴他，通通消息，说说闲话，并劝慰他振作起来，把更多心思放在工作上。经过一年多，老乔才慢慢平复过来。

## 二

20世纪70年代初，中国外交上经历了很多重大事情。1971年基辛格秘密访华时，老乔正生病住在医院里，所以没有参加计划和接待工作。不久我和文晋到医院看望他，他很生气，责怪文晋不来向他汇报。文晋是寡言少语的人，没有说什么。倒是我向他解释了那次是秘密访华，是总理直接领导的，有保密规定。那次看望他，我突然感到他有点变了，火气很大还有点斤斤计较。随后基辛格第二次来访、尼克松访华，乔都参加了并做了许多工作。其中有一件事，使我难忘。在起草《上海公报》的过程中（当然这样重要的文件起草绝不是某人或少数人所能担当的，而是经过无数次的讨论，才有初稿，又经过无数次修改才有上呈稿），上呈稿基本完成，经周恩来总理审定，交给文晋主持作中英文校定，老乔等几人参与。当时老乔提出要修改其中某一重要段落的内容，文晋等人都不同意。但乔很固执，一定要改。因为他是领导，

别人也只得同意修改。稿子送回周恩来总理处，他当即发现改得不对。在第二天接待组的会议上，总理发了很大的火，指着文晋严厉批评：胆子太大又不动脑筋，为什么要改？文晋没有作声，默默承受。会后他才告诉我实情，并说老乔变得狂妄了。我当时很不高兴，心想老乔为什么不站出来承担责任呢？

乔冠华作为中国代表团团长参加了联合国恢复中国席位后的第一次大会，他的讲话（大家都知道，这篇讲话稿并非他个人的杰作，而是外交部有关方面集体的创作，代表国家的）受到极大欢迎。加上他个人的风度举止也起一定作用，自此他声誉大增，也身价百倍了。龚澎去世已两年多，老乔又恋爱了，他再寻伴侣是合情合理的事，朋友们也为此高兴。他的恋人就是章含之。我们与她还有过一点交情，章含之的父亲章士钊先生在解放前夕住在东四八条朱启铃老先生家。全国胜利后，章士钊全家也搬到北京，章含之和父母同住那里。朱启铃先生是文晋的外祖父，我们有时去探望，自然就认识章含之了。她那时还是十几岁的小姑娘。我们很少交谈。直至“文化大革命”以后，她调到外交部工作，慢慢彼此才比较熟悉了，但来往也不多。1972年后有一段时间，章含之突然与我家关系密切起来。一次她来到我家，谈了一会儿她忽然对我亲切地说：听说你还在部里业余学校上英文课？我告诉她我的英文口语很差，到外交部工作很不适应，所以每周有几次去听课补习。她立即说，不要去上那种课了，我来给你当老师，保证你学得快。当时我以为听错了，只好回答她：我怎么当得起你这位老师的学生呢？别开玩笑。她倒是挺认真的，那段时间她曾来过我家好几次，还给我带来《英语900句》的书和录音带，有些还是她亲自录音当教学用的。那些书当时是很难得到的，我心里很感谢她那样热情指教。但她来我家时真正教书很少，倒是常常闲谈。她到外交部不久，情况不熟，常常问到一些情况，特别有兴趣问乔冠华。后来有人点拨我说，她的本意是想让我给乔冠华牵线哩。也许是吧，但我不愿去揣度别人。

乔冠华和章含之的恋爱中出现了插曲。老乔的子女对他的恋爱对象不大满意，我也曾劝说他们，父亲的事你们不必过问。老乔的儿子告诉我并不想干涉，只是想去拜访一下邓颖超大姐，要我联系一下是否能抽时间见一面。我当即答应了，不久老乔的儿子去见了邓大姐。我也不知道他们谈了些什么。随后我接到乔冠华的电话，在电话中他大为震怒，质问我为什么要给他儿子联系去见邓大姐，斥责我多管闲事。当时我惊愕片刻，即给他顶了回去：你儿子去见邓大姐有什么不对吗？你别忘了他同时还是龚澎的儿子！他把电话摔了。过了不多久，邓大姐给我来电话，听声音她有点不高兴地问我：老乔到底怎么啦？他居然打电话来质问我，为什么要见他儿子，都和他谈了什么？难道我不能见见，我会谈无原则的话么？……我劝邓大姐千万别为此生气。老乔已经在电话里把我责骂了一顿，我也不解为什么会这样。

### 三

1972年夏，美国一位中国问题学者洛克珊·维特克到中国访问，想了解中国妇女革命史。她与邓颖超、康克清等几位老同志座谈两天以后又提出要采访江青。几经周折，周恩来总理批示：可以礼节性接见。我们都了解，礼节性接见即无须多长时间，也无须谈许多内容。当时乔冠华副部长指定我作为外交部工作人员去陪见。一天下午，在人民大会堂江苏厅，江青和姚文元一起会见了维特克。外交部也派出了礼宾司官员、翻译、速记员等去工作，还有对外友协的负责人和陪同等，将近10人。本以为礼节性会见不过是寒暄几句、互相认识；谈谈一般性问题。岂料江青有备而来，对维特克大感兴趣，在大会堂谈了几小时，设宴招待，还陪维特克去人民剧院观看样板戏《红灯记》。江青的这种做法使我们陪见人员大为吃惊。最后江青还特别约定在广州继续会见维特克，谈她自己的历史，希望维特克为她写传。这一情况与周恩来总理批示的礼节性会见完全不同。第二天上班时，我即向乔冠华汇报并请示他以后该怎么办？老乔皱了一下眉头说：江青的事情谁管得了？我没办法，随她去吧。当然，江青的事谁也管不了。7月间，她本人去了广州，随后把维特克也接到广州，我们陪见的全班人马也到广州。江

青在广州会见维特克近10次，讲了60小时。内容无所不有，自我吹嘘、编造历史、诋毁别的领导，还有泄密内容等等。在这个过程中我曾数次打长途电话向老乔等领导汇报情况，他们都只回答没办法，随她去吧。直至把维特克送走，我们回到北京，我又特别向他们汇报，江青还要整理记录翻译成英文寄到美国。老乔只耸耸肩，摊开两手，说，这事我真管不了，以后也别向我汇报了，你直接找周总理汇报吧。

此后将近半年时间，我和外交部翻译室徐尔维同志常常在晚上去钓鱼台江青住处，陪她整理、记录，整理好一部分就打印成册，编号登记，作为绝密文件，送给周总理以及王、张、姚，还有外交部姬、乔、王等审阅修改。这期间我曾多次向周总理汇报情况。总理也曾审阅过一部分记录。最后总理认为这份记录实在不应寄到美国去，他曾和江青谈话，告诉她将文字的东西寄往美国会个分被动，劝她自动取消这件事。但江青不仅不听总理劝告，还纠缠总理帮她修改，批准寄出。总理无法处理，只好请示主席。毛主席立刻指示，这份记录绝不能寄出，立即停止整理翻译。总理召集外交部有关人员传达毛主席这一指示，并嘱咐我和徐尔维二人负责把这次谈话的所有记录，包括初稿、整理稿、部分翻译稿全部收齐，分类整理装进一个保密铁柜，贴上绝密封条，交由外交部保密室保管。以后谁也不许动这箱绝密材料。

后来，1976年，“四人帮”被打倒，外交部即把我从中国驻加拿大大使馆调回北京，成立专案组，让我和当年陪同江青见维特克的人员，把有关情况详尽整理成材料，供中央领导参考。要把谈话内容详尽整理，最可靠的原始材料就是当时的记录稿。我们立即想到外交部保密室被封存保管的那一大铁柜记录稿。经领导同意，我们到保密室去寻找，岂料保密室的同志说，材料在两年前被江青连铁柜一起都搬走了。我们大为吃惊：这些材料是毛主席和周总理指定封存不许动用的，江青经过谁的批准能全部取走呢？经过了解，据江青当年的秘书和保卫人员回忆：1974年（或1975年），毛主席曾批评江青和“四人帮”，江青很紧张，怕那些材料可能出事，经当时外交部长乔冠华批准，把铁柜搬到钓鱼台江青处，随即在钓鱼台全部烧毁。我心中十分纳闷，这批材料须经周总理同意才可动用，怎么会这样呢？

#### 四

1973年8月份，文晋被任命为中国驻加拿大大使，同时任命我为政务参赞。

1973年7月，毛主席批评外交部“153新情况”时说：“大事不讨论，小事天天送，此调不改动，势必出修正”。从此开始，江青就抓住把柄，开始批判周恩来总理。到了1973年岁末，讹传周总理与基辛格会谈时有错误，于是又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随后政治局扩大会议，外交部乔冠华等人参加，批判周恩来与叶剑英同志是丧权辱国、投降主义。乔冠华参加批判，他在会上如何表现，现已很难查考。1983年他自己曾对采访他的人说，为此他曾向周恩来同志道歉，并取得谅解。

1974年三四月间，外交部内很不平静。曾经参加1973年12月政治局会议的外交部人员，要在外交部传达政治局会议的内容、精神，同时要对外交部执行的右倾投降主义、修正主义外交路线进行深入彻底批判。那年我们在加拿大工作。以后，据当时在部内的不少同志告诉我，当时气氛很紧张，以姬、乔为首的部党委既有有计划、有步骤的，也不乏有秘密、有公开的活动和布置。当时外交部部长姬鹏飞同志是代表挨批判的，其实大家都清楚，批姬就是批周。投降主义、修正主义外交路线的代表人物，难道是姬鹏飞吗？这帮从政治局回来的人也毫不隐晦地说：姬鹏飞算不了什么，上面有比姬地位高得多，权力大得多的。……大家心里都很明白：这就是批周恩来，把他在外交部批臭……

当年亚非司某负责同志曾带着义愤的口气对我说起当时外交部的情况：在一次亚非司和非

洲司的联席会议上，乔身披灰色大衣，很潇洒地步入会场。在座的同志都很紧张，乔让大家发言，没有人应声。乔即说1970年以后外交部工作中缺点和错误是相当大的，概括地说就是右倾，就是修正主义、机会主义，严重右倾与修正主义没有多大区别。

在乔冠华为首的部领导掌握下，部内展开了严厉批判外交部执行的右倾投降主义外交路线。要求到会的同志人人表态发言。有的同志思想不通，认为周恩来总理领导外交部执行的是正确外交路线；有的同志一直没有发言，后来也被批判了。

1974年在外交部许多同志的记忆中是难忘的。

我们在加拿大工作一年之后，使馆里的一位最年轻的馆员，有一天找我汇报思想（当时我是总支部书记），说一年多来，他都受外交部领导之命经常写信专门汇报大使夫妇的活动情况，使馆发生了什么特殊情况也要汇报。他感觉到使馆内什么都不错都挺好的，没有什么要特别汇报的。他问我以后是否可以不写了。我有点吃惊，真没想到会如此不光明磊落啊！面对这位那么纯真的年轻人，我不在意地说，随便吧，写不写都可以。既然是领导指示你的，写与不写你都应该告诉他们啊。

1974年冬，我们回京述职并休假，我并不具体了解一年多来国内发生的事，这时周恩来总理的病情日渐沉重。

就在那年一个寒冷的夜晚，我和文晋约见乔冠华部长，向他汇报加拿大的情况并请示工作。老乔要我们去史家胡同他的“新居”，我们按时去了。

20世纪60年代周恩来总理因为知道章士钊自北平解放前就一直住在朱启铃老先生家，所以特别命国务院拨史家胡同这所房子给章士钊先生住。这时章士钊已不在，乔冠华这位女婿就住到坐北朝南的正房了。以前我曾来过这里，但如今室内陈设已完全变了。最显眼的是正面那张长条桌，除了不多的陈设品，最令人注目的是几张放大的照片：毛主席和乔冠华握手，章含之在一旁；还有一些较小的与领导握手的各种照片，后旁有周恩来的陪衬。由于太醒目我才仔细看了一遍。在房子正中有一张特为乔预备的安乐椅。他见我们进门即站起来与我们握手，并把我拉到他旁边的一张椅子上坐下。章含之则把文晋带到离得较远处的沙发上就坐，这样安排各自对话就不会互相干扰了。我们本来是要向乔汇报请示工作的，但文晋没说几句话，乔摆摆手制止了。倒是与我个别谈起来，那边章含之也和文晋单独对话了。

我记得乔对我态度很亲切，开始也问及加拿大大使馆一些工作情况，但很快就转了话题，谈起国内“文革”的状况，重点是谈江青。说她领导文化大革命很受毛主席的称赞重用。我觉得奇怪，“文革”初期乔对江青很看不惯，说她打着毛主席的旗号把全国都扰乱了，这会儿怎么变了调。乔说：江青认为我很能干。她知道我从小参加革命表现不错，要调我去“文化组”负责什么工作。乔本来知道，在接待维特克的时候，江青对我很不满意，所以又特意解释，江青没和他提起这件事。我听着乔这些话，两眼直直瞪着他，不知道作何回答。乔感觉到了，于是接着说：当前“文革”的形势你知道，周总理病重，看来不久于人世，识时务者为俊杰嘛，应该好好想想，何况江青那么看重你哩，于是又习惯地哈哈大笑。当时我感觉浑身发颤，难以控制。没想到，原来乔的人生哲学和为官之道就是“识时务者为俊杰”啊。

我们离开乔家，走过黑暗的胡同，感到寒气袭人。我忍不住问文晋，你们谈了什么。他冷冷地说：我根本就不认识江青，她却一个劲说江青对我有好感很欣赏，真是莫名其妙。我脱口而出，这是为江青收罗人才，真是拉帮结伙哩。以后我还听一位与乔过去关系较好的同志说过，他们两口子也遇到完全相同的情况。我感到精神上乔真有点堕落了。这是我与乔最后一次单独

谈话。

周恩来总理病逝，首都人民十分悲痛，对“四人帮”的倒行逆施施加高压十分愤怒，于1976年清明节前后自发前往天安门人民英雄纪念碑悼念。4月4日当天我曾接到外交部部长办公室打来两次电话，询问我是否离家？第三次居然是部长亲自打电话，当即引起我的愤怒，回答说：我什么地方都没去，也不敢去！但心中却感到悲哀，人怎能变成这样！

## 五

1976年10月“四人帮”被打倒，亿万人民欢欣鼓舞，感到又获新生。这时乔冠华开完联合国大会回到北京。当时中央责令外交部对乔冠华与江青的关系进行审查，并请乔说清楚真情。组织审查合乎情理，并非个人恩怨或制造什么冤案。倘若胸怀坦荡、光明磊落，那么说清楚并非难事。当时乔住在家里，章含之住在办公室，组织上要求他们各自说清真情。在这期间，外交部曾召开过两次大会，一次是在北小街禄米仓北京陆军总院礼堂，可容纳500人左右。两次会议我都参加了。我记得当时的情形：部领导坐在、主席台上，乔冠华也坐旁边，大会请乔说清与江青等的关系，并作自我检查。但乔一言不发，不作任何自我反省。这时部内有两三人在原位上发言，批评乔在“文革”后期的一些作为。部内一次大的批判会是在北京工人体育馆，千人左右，还有章含之和其他几个人。主持会议的部长还是希望乔作自我检查，但乔仍不发言。于是有几个同志对他们进行了批评，言辞虽然激烈，但仍是说理的。后来有人造谣说，在“文革”以后乔挨批判还被用“喷气式”、被打等等，这是对外交部广大干部的污蔑，不少同志感到愤怒。在“四人帮”拟定的夺权后的组阁名单中，乔冠华是副总理兼外交部长。“四人帮”垮台了，乔还能当部长吗？这是怎样的冤案呢？既未定罪又无处分，就是不能继续担任外交部长罢了，但仍安排了他的工作啊。

1984年乔冠华在北京病故。当时我们正在国外工作，不久回到北京。外交部管组织的同志来看望我们，同时带来了一份有关乔冠华生平的稿子请我们审读，大概是准备印发或作新闻稿之用。此稿引起一些争议，因为我们和乔共事多年，比较了解，所以想听听我们的意见。稿子整篇看来是客观公允的，对乔的一生中的成绩都一一肯定，最后一段也写了乔在“文革”后期犯了政治性错误。当时的争议是章含之要把这一段删去，否则宁愿不发。但组织认为删掉就不全面了。我们同意这样的看法，认为稿子写得不错，也客观全面。最后就因章含之不同意，文章最终没有发出。报纸上只登了一则简短的消息。

□ 《中外文摘》 2005年第15期

~~~~~

【史海钩沉】

“揪军内一小撮”口号的实质和来龙去脉

• 阎长贵 •

自1967年8月30日，王力、关锋被“打倒”后，在近40年的时间里关于他们的书籍和文章中，在谈到错误和罪行时，几乎无一不说他们鼓吹“揪军内一小撮”。“揪军内一小撮”，也确实是他们被“打倒”（确切地说是被“抛出”）的根据之一。然而，“揪军内一小撮”究竟是怎么回事？其来龙去脉怎样？这是研究“文革”需要探讨清楚的一个重要问题。

◇ “七二〇”事件后，“揪军内一小撮”的声浪像狂飙一样席卷中国大地

1967年的“七二〇”事件，本来是武汉地区军队和一部分群众抵抗和反对“文化大革命”做法的一次大斗争，它反映和体现了不满“文化大革命”的体制性力量和群众性力量。但在当时却被定性为“叛逆行为”，是“党内、军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极端狂妄的进攻”。在“七二〇”事件后，“揪军内一小撮”的声浪像狂飙一样席卷中国大地，继全面夺权风潮造成各级政府和党组织瘫痪后，又使军队及其秩序受到严重冲击。

在“七二〇”事件中，被揪斗和殴打的中央文革小组成员王力和国务院副总理谢富治及随行人员，于7月22日被救回北京，在机场受到周恩来等党政领导人及数万群众的热烈欢迎。当谢富治、王力从飞机上下来后，周恩来、陈伯达、康生、江青等迎上前去，同他们亲切握手、拥抱，陈伯达和江青还左右两边，手挽手地扶着王力走出机场，场面十分热烈和壮观！王力俨然一位胜利归来的英雄。

7月25日，在天安门广场召开了100多万人参加的欢迎谢富治、王力等人胜利归来并声讨武汉地区“党内、军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大会，当时中共中央唯一的副主席、中国人民解放军副统帅林彪也主动参加了这次大会，这更提高了这次大会的地位和声势！

关于“七二〇”事件本身我们不谈，只就“七二〇”事件所引发的关于“揪军内一小撮”的宣传和鼓噪作些介绍和说明。

《人民日报》7月25日所载“新华社武汉24日电”称：“决心把混进党政军里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斗倒斗臭。”

《人民日报》7月26日所载“新华社25日讯”，关于百万军民举行集会的报道说：“坚决打倒中国的赫鲁晓夫，坚决打倒党内军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坚决打倒武汉地区党内、军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7月27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在《给武汉革命群众和广大指战员的一封信》中，亲切、郑重地说：你们英勇地打败了党内、军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极端狂妄的进攻。你们的大无畏精神和果断手段，已经使得一小撮人的叛逆行为，一败涂地。

从此，“党内、军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简称党内、军内一小撮）的口号和提法，便在报刊上，在社会上，铺天盖地地传播和流行起来。细检7月27日到31日这几天的《人民日报》（其他报纸姑且不说），从社论到通讯，从报道到文章，“党内、军内一小撮”的提法每天都出现十几次。

7月27日，林彪主持会议，决定先在内部撤销武汉军区司令员陈再道和政委钟汉华的职务。据杨成武回忆，“在这关键时刻，林彪说了一句关键性的话：‘武汉不单是武汉的问题，而是全国性的问题’，提出‘我们要抓住做大文章’，要批判‘带枪的刘邓路线’，‘揪军内一小撮’，即揪出所谓‘军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关于“揪军内一小撮”的宣传和鼓噪，在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40周年的时候，达到了顶峰。

《人民日报》纪念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40周年的社论《无产阶级专政最坚强的支柱》，说：伟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后，中国的赫鲁晓夫，“纠合混进党内、军内的一小撮资产阶级代表人物，疯狂地进行篡党、篡政、篡军的阴谋活动”。

《红旗》杂志第12期纪念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40周年的社论《无产阶级必须牢牢掌握枪杆子》，说：“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我们要把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揭露出来，从政治上和思想上把他们斗倒、斗臭。同样，也要把军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揭露出来，从政治上和思想上把他们斗倒、斗臭。”“目前，全国正在掀起一个对党内、军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大批判运动。这是斗争的大方向。”

《红旗》杂志第12期还有一篇就“七二〇”事件写的专论，题目叫做《向人民的主要敌人猛烈开火》，其中说：“武汉地区党内、军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公然反抗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把矛头指向毛主席的无产阶级司令部。”“坏事变成了好事。武汉地区党内、军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所策划的阴谋被击败了。一小撮暗藏在党内、军内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被揪出来了。”

《解放军报》庆祝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40周年的社论《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彻底批判资产阶级军事路线》，说：“彻底批判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彻底批判彭德怀、罗瑞卿等军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大破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大破资产阶级军事路线。”

党报、党刊、军报，亦即“文革”中红极一时而又极具权威的“两报一刊”（即《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这三个名字在1967年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18周年时第一次联合使用，此后就成为写重要文章和重要社论的定例，是“文革”中的最高舆论权威），一齐上阵，大肆宣传和鼓噪“党内、军内一小撮”，这不是达到顶峰了吗？

写到这里，有一点需要指出，这就是：中国人民解放军代理总参谋长杨成武在庆祝建军40周年的国防部招待会上的讲话，却只讲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不讲军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这是为什么？这里是否透露出和反映着某种情况和信息？要知道，杨成武当时随同毛泽东在外地，他是奉毛泽东之命回京参加国防部招待会并讲话的。这个不同，即在“揪军内一小撮”问题上，杨成武的讲话不同于“两报一刊”的言论，很值得注意。十分明显，这绝不是无缘无故的。

“揪军内一小撮”的大肆宣传和鼓噪造成了严重恶果，军队及其秩序受到很大冲击，整个形势简直到了“失控”的程度。当时各军区，包括大军区和省军区的告急文电，雪片似的飞向中央，飞向中央文革小组。报告各处揪本地的陈再道，在冲击军事机关，在抢夺枪支弹药等等。而各级政府和党组织都瘫痪了，连告急文电也发不出来了。当时还说什么“形势大好，不是小好”，说什么“乱”，只是“乱了敌人”，而“锻炼了群众”，这完全不是事实。

由于“揪军内一小撮”的宣传和鼓噪，严重地冲击了军队及其秩序，造成了全国性的“兵荒马乱”。毛泽东虽然口头上说“形势大好”，但对这种“兵荒马乱”，不能不忧心忡忡。他在1970年同斯诺谈话时说：“1967年7月和8月，两个月不行了，天下大乱了。”“不能把军队搞乱”，这是毛泽东在“文革”中一个最重要和最基本的信条。当毛泽东看到《红旗》杂志第12期社论鼓吹“揪军内一小撮”时，“义愤填膺”地提出“还我长城”！又针对着报刊上大量和反复出现“揪党内、军内一小撮”的口号和言论，话里有话地指出：不要并提党内、军内一小撮，还是提党内一小撮。并提，很不策略。这就是说，毛泽东把搞乱军队的原因，直接归结为党内、军内一小撮并提，归结为宣传“揪军内一小撮”。

◇ 从《五一六通知》到《军报宣传方针》

“揪军内一小撮”的口号流毒全国，并招致毛泽东不满，究竟是谁先提出这一口号的？

1967年8月22日，因抢夺军备和援越军用物资问题，周恩来在接见广州两派时，严厉地批评他们“简直没有敌情观念”。又指出：“不要再提‘军内一小撮’。‘军内一小撮’是在7月20日事件后宣传机关提错了。”事情果真是这样吗？还是让我们看看事实。

实际上，应该说“揪军内一小撮”在“文化大革命”的第一个纲领性文件《五一六通知》中就有了。1966年的《五一六通知》说：

批判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文化领域的各界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清洗这些人。

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各种文化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是一批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一旦时机成熟，他们就要夺取政权，由无产阶级专政变为资产阶级专政。

谁都知道，这两段话，在《五一六通知》中是极其重要的，可以称之为《五一六通知》的灵魂，其印刷也都是黑体字排印的。

“混进党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是“党内走资派”，其人数是“一小撮”（《五一六通知》中说不是“一小撮”，而是“一批”、“一大批”。1966年8月8日通过的《十六条》中说的还是“一些”。“一小撮”是后来确定和流行的），故称之为“党内一小撮”。

无疑，“混进军队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也是“军队走资派”，其人数也是“一小撮”，故也可称之为“军内一小撮”。

据此，我们说“揪军内一小撮”口号的最早出现应在《五一六通知》，不能算是妄言。当然，在《五一六通知》中没有“军内一小撮”这样的话。

1967年10月5日，中共中央批复军委、总政《关于军队院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紧急指示》，其中说：“也要看到军队院校领导和教职员中，确实有一小撮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坏家伙，一定要借文化大革命的东风，把他们揪出来，彻底斗，彻底批。”

同已有的军委、总政对军队院校“文化大革命”的规定相比，这个紧急指示，是“文化大革命”中关于军事部门“文化大革命”最重要的文件。这里虽然没有出现“军内一小撮走资派”的概念，但有了军内“一小撮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坏家伙”的说法。可以说，这距独立和单独提出“军内一小撮”只有一步之遥了。

1967年1月8日，林彪在军委常委会上提出要加强部队“文化大革命”运动，说部队也有路线斗争，“文化大革命”要搞好搞彻底，要支持“左派”，又任命关锋为总政副主任，主管军报。顺便说一句，关锋被任命为总政副主任，他实际上一天也没到职，但他还是认真地管了军报的。他会同中央文革小组成员、中央宣传组组长王力，召集军报的两位领导，搞了一份四人联名的《关于解放军报宣传方针问题的建议》（简称《军报宣传方针》），于1月10日上送给“全军文革小组并林副主席”，其中第一条就说：

要大力宣传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彻底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彻底揭穿军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极少数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顽固分子的阴谋诡计，热情地坚定地支持无产阶级革命左派把军队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推向一个新阶段。

严格和真正意义上的“军内一小撮”即“军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提法，这是第一次出现。王力，关锋这里说的，是同《五一六通知》精神基本一致的，不同的地方在于他们把“军内一小撮”明确地独立出来。这也可以算作他们的“创造性”吧。

这份《军报宣传方针》，没有送全军文化大革命小组（简称全军文革），却直接交给了中央文革小组第一副组长江青，又由她“嘱”，立即报送林彪。军报代理总编辑胡X代写：“林总：江青同志嘱，速送你批示！”林彪不仅在自己姓上画了圈，还批示：“完全同意。”

这不容置疑地证明，林彪和江青也是认可和同意（并且是“完全同意”）“揪军内一小撮”的。这样，《军报宣传方针》也就确确实实、不折不扣地成为《解放军报》必须执行的命令和指示了。

《解放军报》1967年1月12日的社论《热烈响应毛主席的伟大号召，祝贺新的全军文革小组成立》，说：“让我们高举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伟大红旗，热情坚定地支持革命左派，发展壮大左派队伍，团结广大革命群众，向军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极少数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顽固分子，猛烈开火。”

《解放军报》1967年1月14日发表的社论《一定要把我军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搞彻底》，说：要把军队的“文化大革命”搞彻底，必须“冲破重重阻力”，而“这阻力主要来自军内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来自极少数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顽固分子”。又说：“在我们军队里，确实有那么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极少数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顽固分子，他们当面是人，背后是鬼，两面三刀，欺上瞒下，玩弄资产阶级政客的卑劣手法，抗拒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

1967年3月以后，林彪多次对吴法宪等人说：“要把军队一小撮不好的人，都揪出来烧掉。”1967年7月22日，《人民日报》在头版头条又加编者按，发表空军司令部红尖兵（即林立果）的文章《从政治思想上彻底打倒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其中说：“我们空军领导机关中的无产阶级革命派，遵循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教导，始终把斗争矛头指向以中国的赫鲁晓夫为总代表的党内、军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打倒以中国的赫鲁晓夫为总代表的党内、军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接着，由于“七二〇”事件的爆发，再次把“揪军内一小撮”的宣传和鼓噪推向高潮。

◇ 在“揪军内一小撮”问题上，江青、康生、陈伯达极力推卸责任，王力、关锋成为替罪羊

当毛泽东针对“揪军内一小撮”的狂热宣传，提出“还我长城”，说“党内、军内一小撮”不提不策略的时候，据说江青、康生、陈伯达都慌了手脚，急忙为自己开脱，推卸责任。江青明明看过和同意《军报宣传方针》中关于“揪军内一小撮”的提法，并嘱“速送林彪同志批示”，她现在不提了，并装模作样、“义正词严”地批“揪军内一小撮”。

1967年9月5日，江青在安徽来京代表会议上讲话，说：“早一些时候，有这么一个错误的口号，叫做‘揪军内一小撮’。他们到处抓‘军内一小撮’，甚至把我们正规军的武器都抢了。同志们想想，如果没有人民解放军，我们能够坐在人民大会堂开会吗？（群众：不能！）如果把野战军给打乱了，万一有什么情况，那能允许吗？（群众：不能！）所以不要上这个当，那个口号是错误的。因为不管党、政、军，都是党领导的，只能提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不能再另外提，那些都不科学。结果弄得到处抓，军区不管好坏，差不多都受冲击了……我曾给北京的小将谈过这个问题。”——江青表白她在这个问题上是一贯正确的，而没有一丝一

毫的自我批评。

1967年7月“新华社25日讯”，即关于北京百万人集会的报道，其中“坚决打倒党内、军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是关锋加上、康生审定的，康生说他请示了主席，现在他改口称，他没说什么主席同意了。陈伯达在这个问题上，也极力为自己开脱。

查阅《人民日报》，可以看到，从1967年8月10日开始，关于“揪军内一小撮”的提法就不见了，可谓戛然而止，这显然是对毛泽东“还我长城”呼吁的贯彻和回应。最显著的证明，要算1967年8月16日《人民日报》摘要公布1959年8月16日《中国共产党八中全会关于以彭德怀为首的反党集团的决议》这件事。按理说，利用这件事恰好大讲特讲“军内一小撮”，并且军报社论已经明确断言彭德怀、罗瑞卿等是“军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然而，《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为公布这个决议而写的社论中都不再提“军内一小撮”，当然也不再说彭德怀是军内最大的“走资派”，而只是说彭德怀有那样或那样的罪行。

还有一件事也值得说一说，为“补救”受到毛泽东批评的“八一”社论，在8月中旬，《红旗》杂志又写了一篇关于军队的社论，题目是《伟大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是我国无产阶级专政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可靠支柱》，8月19日由新华社播发，登载在8月20日的《人民日报》上，而在《红旗》杂志上发表则是9月17日出版的第14期了。

当时，陈伯达不仅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文革小组组长，而且是《红旗》杂志的总编辑，《红旗》杂志为纪念“八一”建军节而发表这样重要的社论，他不审阅，不签字，那是不可能发表的，这不仅是惯例，而且是规定，即他作为总编辑的职责所在。这篇社论，毛泽东批评了，陈伯达说他没看过，显然是弥天大谎。

王力在“文革”后回忆说：“当时起很大作用的还有《红旗》杂志‘八一’社论。是林杰起草，关锋审改的。陈伯达看到后鼓掌叫好，说‘好极了’。”

这件事，我也问过关锋，关锋说：“毛主席批评这篇社论后，陈伯达说他没看过，并把有他签字的稿子要回去了，这完全是想推卸责任，是小人的做法——对他这一点，我是很有意见和看不起的。”

《红旗》杂志第12期有两篇社论，一篇是纪念“八一”的社论，一篇是专就“七二〇”事件写的社论《向人民的主要敌人猛烈开火》。据负责处理这篇社论的责任编辑说，这篇社论中有句话就是陈伯达改过的。这句话原为：“……实际上只不过银样蜡枪头一根”，陈伯达将其中的“蜡”字改为“镗”字。此语出自《西厢记》第四本第二折，是红娘讥讽张君瑞的，说：“你原来苗而不秀。呸！你是个银样镗枪头。”所谓“银样镗枪头”，即表面像银质其实是焊锡做的枪头，比喻中看不中用；而“银样蜡枪头”，则不通，也无据。编辑们看到陈伯达这一改，深深赞赏和佩服总编辑知识渊博。

陈伯达撒谎有术，但是骗不了人。只是当时他作为中央文革小组组长，直接关系“文化大革命”的命运，毛泽东不想追究他的责任就是了。

王力在“文革”后回忆说：“8月12日，主席的指示传到北京，说‘党内军内一小撮’的提法不策略。这一问题，虽然不应由我负责，但我觉得自己没有反对，也执行了，便作了自我批评，表示也有我一份错误。但是，江青、康生、陈伯达把责任全推到我的身上来了，实在可笑。”

1967年9月，毛泽东经过两个月的南巡回到北京，据说外交部的王海容去见毛泽东，探听打倒王力的消息，毛泽东只给她念了两句古诗：“时来天地皆同力，运去英雄不自由”，没说别的，便下了逐客令。唐代罗隐这两句凭吊诸葛亮的诗，毛泽东在“文革”中不止一次地吟诵和抄写过。应该说，这两句诗，确实是毛泽东经过“七二〇”事件后的心态写照，也是他在整个“文化大革命”过程中的心态写照，值得我们认真体味。

□ 《党史博览》 2006年第6期

本期编辑：	《华夏文摘》执行编辑：	《CND》总编：
丁凯文（美国）	思语（美国）	陈天寒（美国）
国际统一刊号 ISSN 1021-8602		

投稿专用地址：tougao@cnd.org 其它事项请电邮：cnd-cm@cnd.org

如需有关《CND》和《华夏文摘》各种免费期刊和服务的信息，获取

中文文件：hxwz-info@cnd.org 英文文件：cnd-info@cnd.org

《华夏文摘》万维网服务站（WWW）地址：<http://www.cnd.org/>
